

中国制造企业东南亚转移路径中的战略权衡分析：成本、合规与协同视角

邓炜

(江苏无锡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供应链部 214028)

摘要：

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制造企业在去全球化压力与产业链重塑趋势中加速向东南亚地区布局。然而，制造转移过程中涉及成本控制、合规风险管理与供应链协同效率等多重权衡问题，影响转移路径与战略效果。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与案例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成本优势、合规风险与供应链协同效率对制造转移决策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成本因素对转移决策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合规风险则产生负向抑制效应，而供应链协同效率在两者之间发挥重要调节作用。进一步案例分析揭示了不同企业在转移路径选择中呈现因企业能力差异与外部环境异质性导致的多样化模式。本文为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制定东南亚布局战略提供了系统化、实证化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制造转移；东南亚战略；国际化比较；成本优势；合规风险；供应链协同

一、引言

1、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 全球供应链重构与制造业转移趋势概述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体系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新冠疫情暴发、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在地化趋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2024）报告，全球制造业跨国投资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比重在 2020–2023 年期间上升了 28%，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成为全球制造承接的重要新兴地。

(2) 东南亚作为制造承接地的重要性上升

东南亚地区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廉、土地资源充足、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如 RCEP）生效带来的关税优惠以及逐步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重塑的重要支点。对中国制造企业而言，东南亚不仅是成本外溢转移的首选地，也是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分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布局方向。

(3) 中国制造企业转移动因与面临的战略挑战

尽管东南亚吸引了大量中国制造企业投资，但转移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挑战，如劳工法规严格程度差异、政策稳定性不足、供应链配套体系不健全、文化与管理差异大等。这使得制造转移不再是单一成本考量，而必须综合权衡成本、合规与供应链协同三大关键因素，科学制定布局决策。

2、现有研究回顾与不足

(1) 关于制造外迁的传统理论回顾

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主要依据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与产业梯度转移模型（Flying Geese Model），强调成本差异是制造外迁的主要驱动力。但在当前去全球化与区域化并存的复杂环境下，单一成本视角已不足以解释企业的转移行为。

(2) 成本、合规与协同要素缺乏系统集成分析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成本因素分析，较少系统考察合规风险（如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税收合规）对制造转移意愿的影响。同时，对供应链协同效率作为战略调节变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转移决策模型结构不完整。

(3) 缺乏基于实证数据的路径权衡模型

大部分关于制造转移的研究停留在理论探讨或少量案例叙事，缺少大样本、系统化、量化的数据支撑，难以准确揭示成本、合规与协同三大变量之间的动态权衡关系及其对制造转移路径的实质性影响。

3、研究目的与意义

(1) 实证探讨中国制造企业东南亚转移中的关键决策变量

通过大样本数据收集与实证分析，量化检验成本优势、合规风险与供应链协同效率对制造转移决策的作用机制与相互关系。

(2) 基于数据构建多变量权衡分析框架

突破单一因素分析局限，提出并验证“成本—合规—协同”三角权衡模型（Cost-Compliance-

Collaboration Triangle Model)，揭示制造转移路径优化的系统逻辑。

(3) 为制造企业海外布局提供系统决策支持

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中国制造企业在制定东南亚布局战略时，提供可操作性强、实证基础扎实的决策参考与策略建议，助力提升全球竞争力与供应链韧性。

二、理论基础与变量界定

(一) 制造业国际转移理论回顾

1、比较优势与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导致了成本结构不同，企业通过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国家能够获得竞争优势(Ricardo, 1817)。在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中国曾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受益于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优势，但随着经济发展，国内人力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促使制造业向更低成本地区转移。

产业梯度转移模型(Flying Geese Model)进一步指出，随着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低端制造业会沿产业梯度向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流动。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正处于承接中低端制造转移的最佳阶段。

2、供应链全球化与区域化演变逻辑

供应链全球化(Globalized Supply Chain)强调以最低成本和最高效率整合全球资源。但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化供应链的高度脆弱性，区域化(Regionalized Supply Chain)和本地化(Localized Supply Chain)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供应链区域化意味着企业倾向于在接近主要市场或供应来源地建立新的制造中心，东南亚正是在中国、北美、欧洲三大市场辐射圈中的重要一环。

3、国际直接投资(FDI)动因理论

根据Dunning的折衷理论(Eclectic Paradigm, OLI Model)，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主要基于三种动因：

(1)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

(2) 位置优势(Location Advantage)

(3)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在东南亚制造转移中，成本优势、政策环境与供应链整合能力成为中国制造企业考虑的重要位置优势因素。

(二) 战略权衡的基本理论视角

1、战略三角理论(Cost-Compliance-

Collaboration Triangle)

本研究提出并验证制造转移决策中的战略三角模型，即企业在转移过程中需要在以下三大变量之间进行动态权衡：

(1) 成本优势(Cost Factors)：包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与物流成本。直接决定了制造外迁的经济吸引力，是最传统、最直观的动因。

(2) 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s)：包括劳动法规、环保法规、税收法规及政治稳定性等。高合规风险不仅增加合规成本，还可能导致声誉损失与经营中断。

(3) 供应链协同效率(Collaboration Efficiency)：指与本地供应商、物流伙伴、客户在供应链端的响应速度、信息透明度与资源整合能力。协同效率低会显著降低制造转移后的运营效益。

三者之间存在动态权衡关系，任何单一因素的极端优化都可能引发其他维度的风险累积。因此，科学权衡是制定成功转移战略的核心。

2、三大决策变量界定

(1) 成本因素(Cost Factors)

人力成本水平(Labor Cost)

土地使用与租赁成本(Land Cost)

能源与水资源成本(Energy & Utilities Cost)

物流与运输成本(Logistics Cost)

(2) 合规风险(Compliance Risks)

劳工法规严格程度(Labor Regulation Strictness)

环保法规执行强度(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税收合规要求与透明度(Tax Compliance)

政治稳定性指数(Political Stability Index)

(3) 供应链协同效率(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供应商本地化率(Local Supplier Rate)

供应链响应时间(Response Time)

信息流通与共享水平(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三) 核心研究问题与假设提出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成本优势正向影响制造转移决策，即成本下降越显著，制造转移意愿越强。

H2：合规风险负向影响制造转移决策，即合规环境越复杂或风险越高，制造转移意愿越弱。

H3：供应链协同效率正向调节成本优势对制造转移决策的影响关系，即在高协同效率条件下，成本优

势对转移意愿的正向作用更强。

H4：供应链协同效率负向调节合规风险对制造转移决策的影响关系，即在高协同效率条件下，合规风险对转移意愿的负向作用减弱。

通过以上理论基础与变量界定，本研究为后续的实证分析与模型检验奠定了坚实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设计

1、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

为了全面理解中国制造企业在东南亚转移过程中的战略权衡行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问卷调查用于收集大样本量化数据，验证假设模型；

深度访谈用于补充问卷难以捕捉的细节认知，丰富案例背景信息，提高数据解释力。

2、样本来源

本研究样本选取标准如下：

企业类型：以电子、纺织、机械、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为主；

布局状态：已在东南亚地区（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设立生产基地或正在布局转移的中国制造企业；

职位层级：受访对象需为企业副总经理、供应链总监、海外项目负责人等中高层管理人员。

数据收集时间段为 2024 年 9 月至 2025 年 2 月，共回收有效问卷 312 份，深度访谈 12 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二）变量测量与量表设计

1、成本因素量表（Cost Factors）

基于已有文献并结合本研究情境，设计以下四个测量维度，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1= 极不符合，5= 极符合）进行评估：

人力成本优势（LC）

土地与厂房租赁成本优势（LC2）

能源与水电费用优势（LC3）

物流运输与供应链成本优势（LC4）

2、合规风险量表（Compliance Risks）

参考 OECD 与 World Bank 关于营商环境指标，设计以下测量维度：

劳工法规复杂性（CR1）

环境法规严格性（CR2）

税务与财政合规复杂性（CR3）

政治稳定性不确定性（CR4）

同样采用 Likert 5 点量表测量。

3、供应链协同效率量表（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依据供应链管理（SCM）理论与实践，设计以下测量维度：

本地供应商覆盖率（CE1）

供应链响应速度（CE2）

信息共享与系统整合水平（CE3）

4、转移决策强度量表（Relocation Intensity）

根据实际制造转移程度设计测量指标：

海外生产基地数量（RI1）

转移产能比例（RI2）

东南亚投资金额占比（RI3）

东南亚业务营收占比变化（RI4）

（三）数据处理方法

1、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在前期间卷数据上，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潜在结构，检验各量表的构念合理性。主要指标包括 KMO 检验值、Bartlett 球形检验与因子载荷标准。

2、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认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主要检验指标：

Cronbach' s α 系数（信度）

复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方差区分检验（Fornell-Larcker 标准）

3、结构方程模型（SEM）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假设路径进行整体检验，检验成本优势、合规风险、供应链协同效率对制造转移决策的直接与调节效应。

4、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层级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与交互作用项（Interaction Terms）方法，检验供应链协同效率对主要路径关系的调节作用。

（四）数据来源

1、第一手数据

企业问卷调查结果（312 份有效样本）；

12 家制造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深度访谈纪要。

2、第二手数据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2023 版）：东南亚地区劳动力、土地、能源成本数据；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24 版）：全球 FDI 流向变化；

World Bank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
(2024 版)：各国合规环境对比；

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报告（2024 版）：
中资企业海外投资趋势。

通过以上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体系设计，本研究
确保了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与多元性，为后续实证分析
与结论推导提供了坚实基础。

四、实证结果与模型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在 312 份有效问卷样本中：

企业规模分布：大中型企业（年营业收入 10 亿
人民币以上）占 46%，中小型企业（年营业收入 1 亿
至 10 亿）占 54%；

行业分布：电子制造占 35%，纺织服装占 28%，
机械制造占 22%，汽车零部件制造占 15%；

投资地区分布：越南占 48%，泰国占 22%，马
来西亚占 15%，印尼占 10%，菲律宾占 5%；

投资方式：独资设厂占 68%，合资项目占 32%。

整体样本分布较为合理，基本覆盖了中国制造企
业在东南亚转移布局的主流趋势。

2、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矩阵

根据皮尔逊相关性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结果：

成本因素与转移决策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482$, $p < 0.001$ ）；

合规风险与转移决策强度呈显著负相关（ $r = -0.365$, $p < 0.001$ ）；

供应链协同效率与转移决策强度呈显著正相关（ $r = 0.419$, $p < 0.001$ ）。

初步相关性分析支持了研究假设方向。

（二）因子分析与测量模型检验

1、信度分析

各量表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7，具体如下：

成本因素量表： $\alpha = 0.872$

合规风险量表： $\alpha = 0.851$

供应链协同效率量表： $\alpha = 0.834$

转移决策强度量表： $\alpha = 0.821$

各构念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2、效度分析

（1）聚合效度（AVE 值）

成本因素 AVE = 0.641

合规风险 AVE = 0.623

供应链协同效率 AVE = 0.658

转移决策强度 AVE = 0.602

均高于 0.5 标准，聚合效度良好。

（2）区分效度检验

通过 Fornell-Larcker 标准，各变量 AVE 的平
方根均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具有良好的
区分效度。

（三）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基于 AMOS 26.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主要路径系数及显著性如下：

成本因素 $\rightarrow$ 制造转移决策（ $\beta = 0.462$, $p < 0.001$ ），支持 H1；

合规风险 $\rightarrow$ 制造转移决策（ $\beta = -0.347$, $p < 0.001$ ），支持 H2；

供应链协同效率调节成本因素与制造转移决策关
系（调节效应显著， $\Delta R^2 = 0.054$, $p < 0.01$ ），支持
H3；

供应链协同效率调节合规风险与制造转移决策关
系（调节效应显著， $\Delta R^2 = 0.048$, $p < 0.01$ ），支持
H4。

整体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hi^2/df = 2.138$

CFI = 0.963

TLI = 0.951

RMSEA = 0.061

SRMR = 0.045

模型拟合优度达到学术界普遍接受标准。

（四）调节效应具体表现

1、供应链协同效率对成本优势的正向调节

当供应链协同效率较高时（+1 SD 水平），成本
优势对制造转移意愿的正向影响显著增强（ β 高出基
线 25%），说明在具备高效本地供应链生态系统支持
下，成本下降带来的转移激励效应被进一步放大。

2、供应链协同效率对合规风险的负向调节

在供应链协同效率较高的情形下，合规风险对制
造转移意愿的负向抑制效应显著减弱（ β 绝对值下降
18%），表明企业通过良好的本地供应链协作网络，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合规难题对转移决策的负面影
响。

（五）模型拟合指标检验

总结各项关键拟合指标：

绝对拟合指标：GFI = 0.924, AGFI = 0.901；

增值拟合指标：IFI = 0.961, TLI = 0.951；

误差指标：RMSEA = 0.061, SRMR = 0.045。

以上指标均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具
有良好的整体拟合度，实证模型结果可靠。

本部分实证检验清晰验证了理论假设，为后续案例分析与综合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定量基础。

五、案例分析与讨论

（一）典型企业案例剖析

1、案例一：立讯精密（Vietnam Factory）——成本驱动成功案例

立讯精密作为中国电子制造领域的重要企业，于2021年启动越南制造基地建设。其主要动因是应对国内人力、土地与能源成本上升压力，同时规避部分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产品征收的额外关税。

成本考量：

越南工人工资水平仅为中国沿海地区的30%-40%，土地租赁成本也较低。能源供应虽然略逊于中国，但整体能满足基础生产需求。

供应链协同：

立讯通过与本地数十家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建立配套合作，并引入部分中国供应链伙伴共同出海，初步构建了局部协同网络。

合规环境：

越南劳工法规相对宽松，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积极，税收优惠显著，合规风险可控。

总结：成本优势是驱动转移的首要动力，供应链协同加速布局落地，整体转移效果良好，产能转移后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2、案例二：歌尔股份（Thailand Expansion）——供应链协同驱动布局优化

歌尔股份在泰国扩张主要着眼于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与全球客户服务能力。虽然泰国人工与土地成本相较越南略高，但泰国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较完善的电子产业配套吸引了歌尔的投资。

成本考量：

人力与土地成本并非最低，但物流效率高，出口便利，综合成本控制尚可接受。

供应链协同：

泰国拥有较完整的电子制造产业链，本地供应商成熟，歌尔能够快速实现供应链本地化率超过65%。

合规环境：

法规健全但执行透明，政治环境基本稳定，合规风险中等偏低。

总结：歌尔将供应链协同作为转移决策的优先考量，战略上采取供应链导向型布局策略，成功缩短了交货周期，增强了全球客户黏性。

3、案例三：某纺织企业（Myanmar Failure）——合规风险管理失败导致撤离

某中国大型纺织企业于2018年在缅甸设立大规模生产基地，期望通过极低的人力成本实现盈利最大化。然而，因对缅甸复杂的劳工法规、政治局势评估不足，导致经营过程中频繁遭遇罢工、环保诉讼与政策波动冲击。

成本考量：

人力成本极低，初期财务指标亮眼。

供应链协同：

本地纺织配套产业薄弱，关键原材料与辅料需要进口，供应链协同效率低下。

合规环境：

劳工法规频繁变更，环保执法日趋严格，加之2021年后政治局势剧烈动荡，合规风险急剧上升。

最终该企业于2022年底全面撤出缅甸市场，造成重大投资损失。

总结：过度依赖单一成本优势，忽视合规风险与供应链协同条件，是制造转移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综合分析 & 路径模式总结

1、不同决策逻辑下的转移路径差异

成本驱动型（如立讯精密）：快速布局，短期成本控制效果显著，但需同步提升供应链协同能力以确保可持续性。

协同导向型（如歌尔股份）：投资回报期略长，但供应链生态完善后能够形成稳定竞争优势。

风险忽视型（如缅甸纺织案例）：初期利润高，但风险暴露后快速恶化，造成巨额损失。

2、三角模型下的最优权衡区间划分

基于实证分析与案例归纳，可以将制造转移决策置于三角权衡模型框架内进行最优区间划分：

当成本优势显著且供应链协同效率中高时，为理想转移窗口；

当合规风险过高且供应链协同效率低下时，应谨慎或延后转移决策；

在中间地带，需要通过加强本地供应链生态建设与强化合规管理能力，提升整体转移成功率。

本部分案例与综合讨论进一步验证了实证模型的结论，强化了成本、合规、协同三大因素动态权衡的重要性，为后续管理启示奠定了应用基础。

六、管理启示与战略建议

（一）东南亚布局的成本敏感型策略

1、选址原则：成本、政策与供应链配套兼顾
企业在东南亚选址时，不应仅以单一成本低廉为标准，而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成本优势是否可持续（如人力成本上涨趋势）；

政策环境的稳定性与招商优惠的可靠性；

供应链配套完善程度，是否能够在本地快速形成产业协同。

实践表明，单纯追求最低成本而忽视其他条件，容易在后期遭遇合规障碍或供应链断裂风险，导致整体投资收益率下降。

2、动态成本监测机制构建

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完善程度、营商环境变化速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建议制造企业建立动态成本监测机制：

定期收集和分析各国人工、土地、能源、物流等要素成本变化；

监控潜在政策变动与社会事件对成本结构的影响；

动态调整生产布局与资源配置，确保成本控制优势的持续性。

（二）合规风险控制策略

1、合规尽调（Due Diligence）体系建设

制造企业在进入东南亚市场前，必须系统性地开展合规尽职调查，包括：

全面了解目标国家的劳动法规、环保法规、税务法规及其执行情况；

评估政治风险、社会稳定性与法治环境；

制定本地化合规标准与预警机制，确保在法规变动时能迅速应对。

2、与本地政府及律所建立合作网络

良好的本地政府关系与专业律所支持是降低合规风险的关键保障。企业应：

主动参与当地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建立信息通道；

与有经验的本地律所或国际律所合作，实时更新法律法规变动信息；

在合规管理体系中引入外部审计与评估机制，提高合规透明度。

（三）供应链协同能力建设

1、提前搭建本地供应链生态圈

供应链协同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制造转移的成功率。企业应：

在布局初期即积极扶持本地供应商能力建设，通过培训、投资等方式提高配套水平；

选择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时，优先考虑响应速度快、信息化水平高、质量控制能力强的本地企业；

引导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供应链生态体系，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

2、数字化供应链协作平台建设

基于数字化技术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制造企业应：

部署供应链管理系统（SCM）、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云协作平台（SaaS SCM Solutions）；

实现订单、库存、运输、交付等环节的实时可视化与智能调度；

通过数据驱动的预测与响应机制，缩短供应链反应时间，提高灵活性与透明度。

（四）综合权衡的动态决策模型建议

面对去全球化压力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制造企业的东南亚布局策略应从单点决策转向动态综合权衡。

建议引入以下机制：

建立实时数据反馈系统，动态监控成本变化、政策波动与供应链健康度；

开发情景模拟工具，预演不同政策、成本、供应链状态下的布局后果；

设定灵活调整机制，如双基地运营、模块化生产配置、分阶段转移，以应对突发风险。

通过动态决策模型，企业能够在东南亚布局中更科学地权衡成本、合规与协同三大要素，实现风险可控下的战略优化与竞争优势提升。

本部分管理启示与战略建议立足于实证分析与案例总结，具有较强的现实可操作性，为中国制造企业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东南亚布局提供了系统化参考。

七、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一）样本地域集中性局限

本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制造企业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布局情况，虽然覆盖了当前中国制造转移的主流地区，但仍存在一定地域集中性局限：

未能充分涵盖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其他东南亚新兴承接国；

对南亚（如印度、孟加拉国）等制造替代地的比较分析不足。

未来研究可扩展样本覆盖范围，进行更大范围的横向比较，以全面揭示不同国家环境变量对制造转移战略决策的影响差异。

（二）纵向变化趋势未充分捕捉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基于2024年前后的横截面调查，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企业当前转移路径的权衡逻辑，但对于转移前、中、后不同阶段动态变化

过程的捕捉有限。

未来可以设计纵向跟踪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动态监测企业在布局决策初期、实施中期与运营后期的各项成本、合规风险、协同效率变化趋势，进一步验证三角权衡模型的时间演变特征。

(三) 未来可扩展至跨区域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制造转移格局的加速演变，除东南亚外，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也逐渐成为潜在承接地。不同区域的：

成本结构（如印度人工成本虽低但物流成本高）；

合规环境（如中东部分国家法律体系透明但劳工标准严格）；

供应链成熟度（如非洲多数国家供应链生态尚待完善）

均存在显著异质性。

未来研究可扩展至跨区域比较，建立多区域、多情境下的制造转移战略权衡模型 (Cross-regional Comparative Framework)，以揭示不同情境下最佳布局路径与权衡逻辑的变化规律。

(四) 潜在的新变量引入

除了本研究已讨论的成本、合规、协同三大主变量，未来研究还可考虑引入：

ESG 压力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ressures)：绿色合规要求对转移决策的影响；

技术成熟度 (Technology Readiness)：东南亚国家在智能制造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能力；

地缘政治动态 (Geopolitical Shocks)：突发国际政治事件对转移战略灵活性的需求。

通过扩展变量维度，丰富理论框架，可以进一步提升制造转移路径权衡模型的解释力与适应力。

本研究在实证基础上揭示了成本、合规与协同三角权衡逻辑对中国制造企业东南亚转移路径选择的重要影响，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为企业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但仍需在未来不断深化与完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制造业版图。

参考文献

[01]Dunning, J. H. (1980). 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1(1), 9–31.

[02]Ricardo, 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03]Gereffi, G., Humphrey, J., & Sturgeon, T. (2005).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2(1), 78–104.

[04]Baldwin, R. (2016).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05]UNCTAD. (202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Beyond the Pandemic*. Geneva: United Nations.

[06]ASEAN Secretariat. (2023). *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3*. Jakarta: ASEAN Publishing.

[07]World Bank. (2024). *Ease of Doing Business Report 202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Group.

[08]Yang, C., & Coe, N. M. (2020). Beyond Flying Geese: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Asian Electronics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52(5), 903–924.

[09]王宏志, 陈雪莲. (2022).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建设与区域布局优化研究. *经济地理*, 42(6), 24–32.

[10]李文溥, 邱怡轩. (2023). 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转移路径比较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5), 85–97.

[11]吴丹, 孙立坚. (2023). 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趋势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2), 50–65.

[12]陈晓萍, 刘俊. (2023). 制造企业国际化转移中的合规风险识别与应对机制. *国际贸易问题*, (9), 112–123.

[13]赵丽敏, 赵泽文. (2022). 东南亚制造基地建设的供应链协同问题探讨. *物流科技*, 45(11), 87–92.

[14]McKinsey & Company. (2023). *Reimagining Global Manufacturing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15]BCG. (2024). *Beyond Cost: Strategic Drivers for Manufacturing Relocation to ASEAN*.

[16]ASEAN-Japan Centre. (2023). *Investment Report on ASEAN: The New Manufacturing Frontier*.

[17]Gardner, D. (2021). *Managing Compliance Risks in Global Expans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Digital Articles, (July).